清代圆明园八旗驻防的设立及其户口演变与户口特征*

韩光辉

This essay examines population statistics for the Banner Garrison at the Yuanmingyuan from its establishment in 1724 through the fall of the Qing in 1914. The population of the garrison increased rapidly during the early years of its establishment but slowly in the later period when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was stable, family size was small, imbalance in the sex ratio was high and the age structure was skewed. This w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fluctuation and variation in population of the Banner forces in the Qing.

圆明园创建及八旗护军驻防是清代北京政治中心的部分职能向西北郊外转移的重要标志。圆明园八旗驻防户口在特定环境下形成了特定的增长过程和户口特征，为探讨清代八旗驻防户口提供了重要个案。

一、圆明园及八旗驻防的设置

圆明园始建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 年），系皇四子胤禛的赐园。园名为康熙御书。胤禛登基后，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朝修建开拓，成为当时举世闻名、规模宏伟且又融东、西方造园艺术于一体的皇家苑囿。后毁于英法联军与八国联军的两度焚掠。

据雍正《圆明园记》，早在雍正初年，已开始“建设轩墀，分列朝署”，即“构殿于园之南，御以听政”；并在大宫门外，依京师制度，规划建筑诸部院寺监之衙署，“俾侍值诸臣有视事之所”。至雍正三年（1725 年），又“诏以是园为春、夏、秋临御听政之所”[①]。自雍正到咸丰园居处理朝政的时间每年至少在半年以上，还不包括乾隆等巡行塞外，临幸承德避暑山庄及围场秋猎的两三个月时间。因而清代北京西郊皇家园林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紫禁城的地位。当然，一些重大的典礼、仪式还是要在皇宫内举行。其实早自康熙始，即已在畅春园料理朝政了。按《养吉斋丛录》，“计一岁之中，幸热河者半，驻畅春园者又三分之二”。一岁中幸热河半年，显属误记；驻畅春园 8 个月，亦未必符实；但也足以证明康熙每年园居时间之长。

究其原因，还应从多尔衮生前的一道谕令说起。顺治七年（1650 年）七月，摄政王多尔衮谕令称：“京城建都年久，地污水咸，春秋冬三季犹可居止，至于夏月溽暑难堪。但念京城乃历代都会之地，营建匪易，不可迁移。稽之辽金元曾于边外上都等城为夏日避暑之地。予思，若做前代造建大城，恐糜废钱粮，重累百姓。今拟止建小城一座，以便往来避暑。”[②]遂征用九省钱粮，于口外喀喇河屯（滦平）滦河北岸修筑滦阳别墅，工程于次年二月完成；五月顺治出塞巡幸即驻跸该处行宫。但多尔衮死后被“削号黜庙”，滦阳行宫亦随之废弃了。康熙亲政之后出塞，除在滦河南岸另筑行宫、在滦河上游开辟木兰围场（1681 年）外，还在热河上源始建了避暑山庄（1703 年），以为皇家避暑之所。

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还利用明代国戚武清侯李伟别墅“清华园”旧址修建了畅春园，是为清代京城西郊第一处皇家苑囿。按康熙《畅春园记》，海淀“沃野平畴，澄波远岫，绮合绣错，盖神皋之胜区也。朕临御以来，日夕万机，罔自暇逸，久积辛劬，渐以滋疾。偶缘暇时，于兹游憩，酌泉水而甘，顾而赏焉。清风徐引，烦疴乍除，爰稽前朝戚畹武清侯李伟因兹形胜，构为别墅”[③]。积劳成疾的康熙缘暇游憩海淀，饮甘泉沐清风，烦劳病痛一扫而尽，与前述多尔衮谕令内容相比较，足见清

代北京西郊皇家苑囿迅速兴起的环境条件占主导地位。

雍正《圆明园记》，称圆明园取天然之趣，为避暑迎凉之计；及乾隆《圆明园后记》，谓圆明园"实天宝地灵之区，帝王豫游之地，无以逾此"[④]；均反映了清代帝王追求山水名胜和幽雅环境的情趣及逃避城内不断恶化之环境的心态。

圆明园既然系皇家御园，每年的大部分时间皇帝园居处理政务，为安全计，故于雍正三年（1725年）专设京师八旗驻防护军。其职掌在于守卫与清跸。[⑤]

事实上，于圆明园设置八旗驻防护军还拥有养赡京师旗人的考虑。据雍正二年（1724年）十一月十五日谕："轸念八旗人等，生齿日繁，令分居圆明园、郑家庄、热河、宁夏等处，俾遂生养，又特开井田以为八旗养赡之地"；四年（1726年）六月十三日谕："从前八旗护军俱由京城往畅春园换班行走。朕念其往返之间稍觉费力，特发帑金数十万两于圆明园附近盖造房屋，派护军三千名居住，以供圆明园之差役，既有益于贫乏无房之人，而在京之护军又得免于往来行走之累，又念此三千护军差役甚多，是以叠沛恩施，不一而足。"[⑥]由此谕令，结合京师八旗历经康熙后期数十年的繁衍生息形成的"满洲户口滋盛，余丁繁多……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⑦]的状况，可知清政府开始采取各种养赡旗人的措施，[⑧]缓解京师八旗人口压力的事实，不难发现，雍正即位初即自京师挑取三千余名所谓"贫乏无房之人"以为圆明园护军，每兵赐予官房三间，携眷驻防，显然带有疏散京师旗人，养赡贫乏的用意。

二、圆明园八旗驻防兵制及养赡措施

据《大清会典事例》，雍正二年（1724年）初设圆明园护军营官兵3136员名，养育兵96名，共3232员名；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官兵增至4152员名，养育兵1000名；嘉庆十一年（1806）官兵4452员名，养育兵1826名，共计达6278员名。其中护军营官兵较初设时期增加了1316员名，养育兵增加了1730名。[⑨]因养育兵多系10岁以上未成年之余丁或系16岁以上但并无职任的闲散，还不能视为可以独立门户的护军，而一般属于护军官兵户下隶属人丁。

按照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官员由总统八旗事务的王公大臣掌其升选铨补，俱由本旗内挑选的官制，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官兵选补系统，即除初设护军营自京师派驻官兵两次共4000余员名外，后来兵丁的增加一般依赖护军营各旗自身的增殖。这可能与圆明园八旗护军营拥有特殊的防卫任务有关。

正因为如此，圆明园护军营官兵享有种种优惠政策。除官员依次由内部铨选挑补，增加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官员编制，增给钱粮外，还有：

增设养育兵，养赡旗人。雍正二年初设养育兵，原因就是"承平日久，满洲户口滋盛，余丁繁多……闲散满洲，至有窘迫不能养其妻子者……若不给以钱粮，俾为养赡，何以聊生"。[⑩]雍正六年（1728年）七月谕："满洲人丁日益蕃息，护军马甲皆有定额，恐其不敷养赡，朕特施恩，将幼丁挑为养育兵，令食钱粮，以为养赡。"[⑪]乾隆三年（1738年）谕："再四思维，八旗生齿日繁"，故而议定，"人多旗分，照例挑取十岁以上之余丁"；"人少旗分，先尽十岁以上之余丁挑取，不敷，再于十岁以下之幼丁内挑取"。至嘉庆时又有谕称，皇考"于八旗生计，随时酌量，办理尽量，今阅数十年，八旗户口，又益加增，自应再筹办理"[⑫]。自雍正历乾隆至嘉庆是八旗户口包括圆明园护军营兵丁户口持续增长的时期，旗人生计倍受朝廷关注，并通过挑补甲兵和养育兵、支给钱粮，以养赡之，是持之以恒的政策。

建造营房，赐予官兵居止。雍正二年即于圆明园周围建造营房八所，分驻八旗护军营。每旗营总给房十三间，副护军参领二人，各给房十间；署护军参领四人，各给房八间；护军校十人，各给房六间；护军三百七十五名，各给房三间；每旗营房1250间，累计达一万间。在陆续增设圆明园驻防官兵之后，增建住房至少应在4500间以上。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营房2538间，二十九年（1764年）重修营房9898间，四十五年（1780年）重修营房12806间，各官兵门楼3977座，隔断院

墙达46900丈。[15]如此浩大的修建工程费用全部出自内帑。仍须指出的是，内城兵丁住房一般是一或二间，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于内城八门外建房赏住八旗穷乏兵丁携眷驻扎，亦为每丁两间。

此外，圆明园护军营官兵仍享受与在京八旗护军完全相同的优恤，如嘉庆五年（1800年）增给办事营总养廉银各一百两。还建有官学，分置学舍三处，设教习教导护军官兵子弟。盖因清政府对圆明园八旗驻防护军官兵“叠沛恩施，不一而足”，京师八旗护军尝与攀比，曾遭到雍正的指斥。[13]

正是因为诸帝王“视满洲最为关切，乃国家之根本，非其它所可比”[15]，待遇优厚，使生计无虞，故产生了至乾隆五十年（1785年）“圆明园设立兵丁已经六十载，滋生人口众多”[15]的社会效果。这就是自雍正至嘉庆近百年间圆明园八旗驻防官兵户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三、户口增长特点及户口特征

依前所述，圆明园八旗驻防护军初设时，每旗满洲官兵均392员名，随之增设的护军参领、护军校、副护军校及笔帖式也是均等的，每旗均是23员名，合初时每旗各有官兵415员名，至乾隆五十年增加护军300名后，每旗

族别	旗分	雍正二年（1724年）		民国三年（1914年）								
		户（丁）*	口**	户	口	男	妇	子	女	户量	男妇性比	子女性比
满洲	镶黄	415	1000	~401	1625	612	405	276	332	4.1	151.1	83.1
	正黄	415	1000+	343	1436	378	333	349	376	4.2	113.5	92.8
	正白	415	1000+	430	1743	630	416	331	366	4.1	151.4	90.4
	镶白	415	1000+	399	1593	621	399	284	289	4.0	115.6	98.3
	正红	415	1000+	381	1405	573	346	226	260	3.7	165.6	86.9
	镶红	145	1000+	473	1790	711	472	265	342	3.8	150.6	77.5
	正蓝	415	1000+	359	1592	480	365	448	299	4.4	131.5	149.8
	镶蓝	415	1000+	379	1419	635	357	160	267	3.7	177.9	59.9
	合计	3320	8000+	3165	12603	4640	3093	2339	2531	4.0	150.0	92.4
		乾隆十二年（1747年）										
蒙古	镶黄	100	250+	129	498	202	125	79	92	3.9	161.6	85.9
	正黄	100	250+	161	706	188	161	195	162	4.4	116.8	120.4
	正白	100	250+	128	518	197	117	102	102	4.0	168.4	100.0
	镶白	100	250+	209	695	251	177	147	120	3.3	141.8	122.5
	正红	100	250+	184	319	218	168	117	116	3.4	129.8	100.8
	镶红	100	250+	60	275	95	58	55	67	4.6	163.8	82.1
	正蓝	100	250+	180	796	232	198	221	145	4.4	117.2	152.4
	镶蓝	100	250+	90	351	166	90	31	64	3.9	184.4	48.4
	合计	800	2000+	1141	4458	1549	1094	947	868	4.2	141.6	109.1
总计		4120	10000+	4306	17061	6189	4187	3286	3399	4.0	147.8	96.7

* 雍正二年派驻圆明园官兵以丁计，按丁分配住房，实即一户；包含雍正三年和十年增设的驻防官员在内。

* * 驻防八旗官兵初设时每户（丁）口数甚低，依2.5口计。资料来源：《清会典事例》、《八旗通志》、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1914年京师巡警总厅关于圆明园八旗官兵户口统计册。

设置官兵则增加到450员名上下。而乾隆十二年自京师移扎圆明园的800名蒙古八旗护军，

平均每旗100名。乾嘉之际满蒙八旗合计每旗拥有官兵550员名上下。此外，每旗又各有养育兵220余名。

自嘉庆十一年（1806年）历经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和宣统一百余年的发展，至民国初的1914年，据京师巡警总厅对圆明园八旗驻防官兵的户口统计，满蒙驻防圆明园八旗共计4306户，17061人（见上表）。为了实现雍正与乾隆初设置圆明园满蒙八旗驻防护军与清室逊位之后该部户口统计的可比性，还必须对初置时的户、口加以必要的讨论。

由前述设立圆明园驻防护军"有益于贫乏无房之人"的谕令来看，这支新组建的八旗军队首先是由京师内城贫乏无房的旗人、其次则是到了当差年龄而无职任的闲散旗人组成。这些人一般以两代家庭和应役单身男子为主，虽然每兵丁作为一户分配三间一套住房，但平均每户人口或丁口比显然偏低。以同时组建驻防京郊郑家庄护理王府的六个佐领为例，历经15年，至乾隆二年（1737年），平均每户只有3.2口，丁口比则为2.7。[17] 其在雍正元年（1723年）组建时，平均每户（丁）人口大约在2.5以下。依此，雍正初组建的圆明园满洲八旗驻防护军营每旗415员名亦即415户，每户约2.5口，每旗驻扎一地，总人口约1000余人；乾隆十二年移扎圆明园的蒙古八旗每旗100丁亦即100户，拥有人口约250口。是时圆明园满蒙八旗驻防护军每旗515户，1250余人，并按八旗驻扎方位在圆明园周围形成八个军事聚落。

由上表可知，历经190年的发展与演变，圆明园满蒙八旗驻防护军及其所属户口发生不少变化，形成了明显的特征。[18]

人口增长状况　按户计，圆明园满洲驻防八旗中户数增加的只有正白与镶红二旗，其余六旗均减少了，故总户数在190年间由3320户减少到3165户；蒙古驻防八旗除镶红和镶蓝二旗明显减少外，余六旗均增加了，故总户数自乾隆十二年移驻至1914年的167年间由800户增加到1141户；因而使满蒙驻防八旗总户数自雍乾两代完成移驻之后的4120户增加到1914年的4306户，增加了186户。此186户不是乾隆之后自京师八旗移驻，而是圆明园驻军的分居。其中主要还是蒙古驻防旗人的分居。据口计，圆明园驻防八旗无论满洲还是蒙古均明显增加了。这一方面是最初自京师移驻的护军以贫乏兵丁为主，户量均偏低，而移驻之后经过一二百年的休养生息，人口增殖，各旗人口均有增加。满洲八旗驻防人口由大约8000人增加到12600人，190年间平均增长率为2.4‰；蒙古八旗驻防人口则由大约2000人增加到4458人，167年间平均增长率为4.8‰。事实上，圆明园驻防八旗护军人口增长过程在不同时期存在明显差异。按照雍正至嘉庆增设护军和养育兵的数目和过程计算，自乾隆初年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驻扎圆明园的满蒙八旗人丁增长率高达6.8‰，代表了清代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生活优裕时期八旗人口增长的普遍水平。而道光之后，由于京师八旗闲散人口的疏散移住，历次内外战争的消耗及其经济来源的萎缩和经济生活的困顿等原因共同作用，人口增长过程大为减缓了，因而导致清代后期圆明园满蒙驻防护军人口增长率偏低，增长缓慢的特点。

户量与家庭状况　由于驻防的职能、性质及抽调护军指导思想的限制，组建圆明园护军营抽调兵丁以贫乏、单身占有相当比重，故而户量偏低，一如前述。但历经一二百年的发展变化，圆明园八旗护军营官兵的平均户量已发生了一定变化。按1914年统计，满洲八旗户量已达到每户4口，蒙古八旗户量则已达到每户4.2口。平均户量最高的有满洲正蓝旗每户4.4口，正黄旗4.2口，镶黄与正白旗均为4.1口；蒙古镶黄旗每户4.6口，正黄与正蓝旗均为4.4口等。平均户量最低的有满洲正红与镶蓝旗均为3.7口，镶红旗3.8口；蒙古镶白旗3.3口，正红旗3.4口，镶红与镶蓝旗均为3.9口等。圆明园八旗驻防护军的户量较当时社会总户口尤其汉人户口偏低，家庭成员人数偏少，主要是由于它的军事驻防性质所决定。该部分旗人除家庭规模偏小外，复合家庭少，单身与缺损家庭占一定比例也是一个重要特点。按上表统计，在4306户旗人家庭中，平均每户有1.4个成年男性人口，而至少有119个家庭无成年女性人口，2000多名成年男性人口无配偶。如果考虑到某些旗人家庭可能有二到三名成年女性人口，那么事实上的缺损家庭及无配偶男性人口的数目更大。每个家庭的子女数，平均也只有1.5人。综合考察，未婚兵丁单身家庭和缺损家庭显然仍占有一定比重。

性别比与年龄构成 按清代户丁统计制度，人丁是指16岁至60岁的成年男子。但1914年圆明园满蒙驻防护军户口统计则包括男、妇、子、女等项。其中的男不仅含盖了16岁至60岁的男丁，还包括60岁以上的老年男子；妇则包括全部已婚女性人口及一部分未婚但已年长的女性人口，子、女则是户主以下全部未婚男、女，主要是15岁以下的未成年男性与女性人口。按该年户口统计，圆明园满蒙驻防八旗护军总人口性别比为124.9，显然偏高。其中成年人性别比更高，为147.8；而子女性别比则为96.7，又偏低。这是清代军事驻防人群及旗人男婚早女婚迟的婚俗所致。按该项户口统计，求其确切的人口年龄构成显然是困难的，原因在缺乏60岁以上老年户口统计。故而只能大体计算其中成年人（含老年人）和子女人口所占比重，分别为60.8%和39.2%。如果将此次户口统计中的子女全部理解为15岁以下未成年人口，其比重高达39.2%，表明圆明园满蒙八旗驻防护军人口大体属于年轻型人口。老龄人口因含于男妇人口中，无法区别开来。

总体上来看，清代圆明园满蒙驻防八旗护军户口具有前期增长快、后期增长缓慢，户量偏低、家庭规模小，性别比偏高、年龄构成不够合理等户口特征；且在清代八旗户口增长变动过程中具有一定代表性。因此，该项户口统计可以作为清代八旗驻防户口研究的重要个案。另一方面，上述户口特征在满蒙驻防各旗分中又有各自不同的表现形式，例如满洲正黄旗、蒙古正黄旗与正蓝旗男妇性别比均属正常范围，因而家庭构成以核心家庭为主等。

仍须说明的是，1914年京师巡警厅对圆明园八旗官兵的户口统计，是在清光绪末年至宣统中制定了具有近现代意义的清查户口章程(1904年前后)、调查户口章程（1908年)、民政部暂定京师调查户口规则（1909年）及户籍法（1911年）等重要法规之后进行的，故而该项调查具有较高的可靠性和可信度，据以进行驻防八旗户口特征分析应具有一定科学性。

---

①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8，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②《清世祖实录》卷49，顺治七年七月。

③《日下旧闻考》卷76，《国朝苑囿》。

④《日下旧闻考》卷80，《国朝苑囿》。

⑤⑨⑬⑯《大清会典事例》卷1167，《圆明园护军营》。

⑥⑭⑮钦定《八旗通志》《卷首九·敕谕三》。

⑦⑩⑫《大清会典事例》卷1121，《八旗都统·兵制》。

⑧韩光辉《试论清代北京城市人口增长与控制》，载《京华旧事存真》，第一辑，1992年。

⑪钦定《八旗通志》《卷首十·敕谕四》。

⑰《清高宗实录》卷43，乾隆二年。

⑱京师巡警厅：《圆明园八旗官兵户口统计册》1914年1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档案。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871036）研究成果。

(作者韩光辉：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邮编100871)

CONTENTS

1 Some Perspectives on the Research in Qing History for the 21st Century

POLITICS AND LAW

7 Zheng Yonghua The Psychological Evolution of Secret Societies during the Years Leading to the 1911 Revolution

14 Chi Yunfei The Concept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by Officials Advocating Establishment of a Constitution at the End of the Qing Dynasty

23 Zhao Xiaohua The Problem of Long – pending Legal Cases in the Late Qing

SOCIETY AND ECONOMY

32 Zhang Xiaoye The Problem of Anti – smuggling in the Qing Salt Administration

42 Tong Yonggong A Brief Commentary on Activities Related to the Shengjing Ginseng Monopoly

50 Xu Hao The Management of Extensive Agricultur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Qing Dynasty

LEARNING AND CULTURE

61 Tian Hanyun Preliminary Discussion of Zhuang Cunyu' s *Correct Version of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Chunqiu zhengci)

69 Shen Yan The Cultural Essence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Late Qing Collected Essays on Statecraft

RESEARCH ON POPULATION

75 Wang Weiping Foundling Homes in Jiangnan in the Qing Dynasty

86 Han Guanghui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Banner Garrison at the Yuanmingyua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Special Features of its Population

RESEARCH NOTES

91 Lü Xiaoxian Three Problems Regarding Qing Official Residences Paper (Di Bao)

97 Xi Yuan Narrative of Wang Cong' er Rebellion

BOOK REVIEWS AND TRENDS

105 Reviews on *China and the World in the* 18*th century*.

110 Zhu Hu Ghosts of Great Times —— a Review of P. Kuhn' s *Soul – stealers*

113 Ho Ping – ti In Defense of Sinicization: A Rebuttal of Evelyn Rawski' s Re – envisioning the Qing (Part One)

121 Liu Zhonghua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Conference on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for Aid in Government*, *Qing Edition* (Qing Tonjian)

124 Xu Danliang A General Report on the Second Conference on Manchu Studies